

独自文存之二

待
家
集

张厚余著



张厚余 著



散文 · 随笔

綺

霞

集

旭陽著



张厚余 著

種看雲真，泰山毫髮無長髮，林壑高深《鼎突泉》。多情秋水，而
能詩述江河，相照醉千人。空谷竹柏公皆贊，化動紫雲深。惟有其神山不
露音，卓立東方待日升。萬象含春山雨潤，深藏雲幕不虛承。跨海西山黃
虎出，玉珠白鷺飛。共賞風流詩賦美，我亦難平心向深。微林長黑處吹歌
急，照望天邊共笑聲。早醉山東大聖君，舉鞭歌夜曲同。翠玉貢參，登臨
新奇同。攀今根葉未移時，表國人知遠近取裁無所云。故想參參丈量平
北京，誰知文海何無外。名存半文真古意，義重半快昇玉宇中。故故半
賦賦出塵煙古西山，寒天杯火文火令人醉，鑿半文煙英，外半華光止工
行，降林變半赤，落寺半交英舍。半壁寒烟，重顧珠浦在春半西山。對此共
之半比一派出後半西山，群王交手處；半許半古文盡，宋徵半引文書西山
美極重林荷半乘會國事，參盡珠亭半詩，參奇半奇大音少歌春風。半王
回半言衣古半丘，詩山歌六尺半乘蓋。半氏半律長，表半，半御半集。貞
者，只此文集耳。此為奇主之詳評，吾輩欣幸，毛氏詩解是集之注解。刻起
之本中，余多與之。半解半解出半文黃溪利酒教音半卷集文本，用此。半
集者，半解半解也。半解半解出半文黃溪利酒教音半卷集文本，用此。

書名：《綺霞集》

作者：張厚余

出版者：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龍中央郵局 73369 信箱

規 格：175 × 240 印 張：28.5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78-962-8735-26-8

定 價：港 幣 75 元

人民幣 60 元

作者简介

张厚余，山西寿阳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太原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典散文学会理事，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傅山研究会副会长，太原市作协原副主席，太原市六、七、八届政协委员，山西省诗词学会、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太原市诗词学会顾问。主要著作有文艺评论集《寻芳屐痕》，散文集《秋华集》，诗词集《凝春集》，古典文学研究专著《傅山诗文选注》、《太白诗传》、《杜牧集解评》、《元曲精品类编·关汉卿卷解评》、《明清小品文解评》、《祁隽藻诗注析》等。主编《全宋词鉴赏辞典》，参与编撰十余部国家级古典诗词曲鉴赏辞书。获省市诸多文学理论、创作奖项。膺“杰出贡献艺术家”、“太原市优秀作家”称号。

菊
玲
光

指
舌
右
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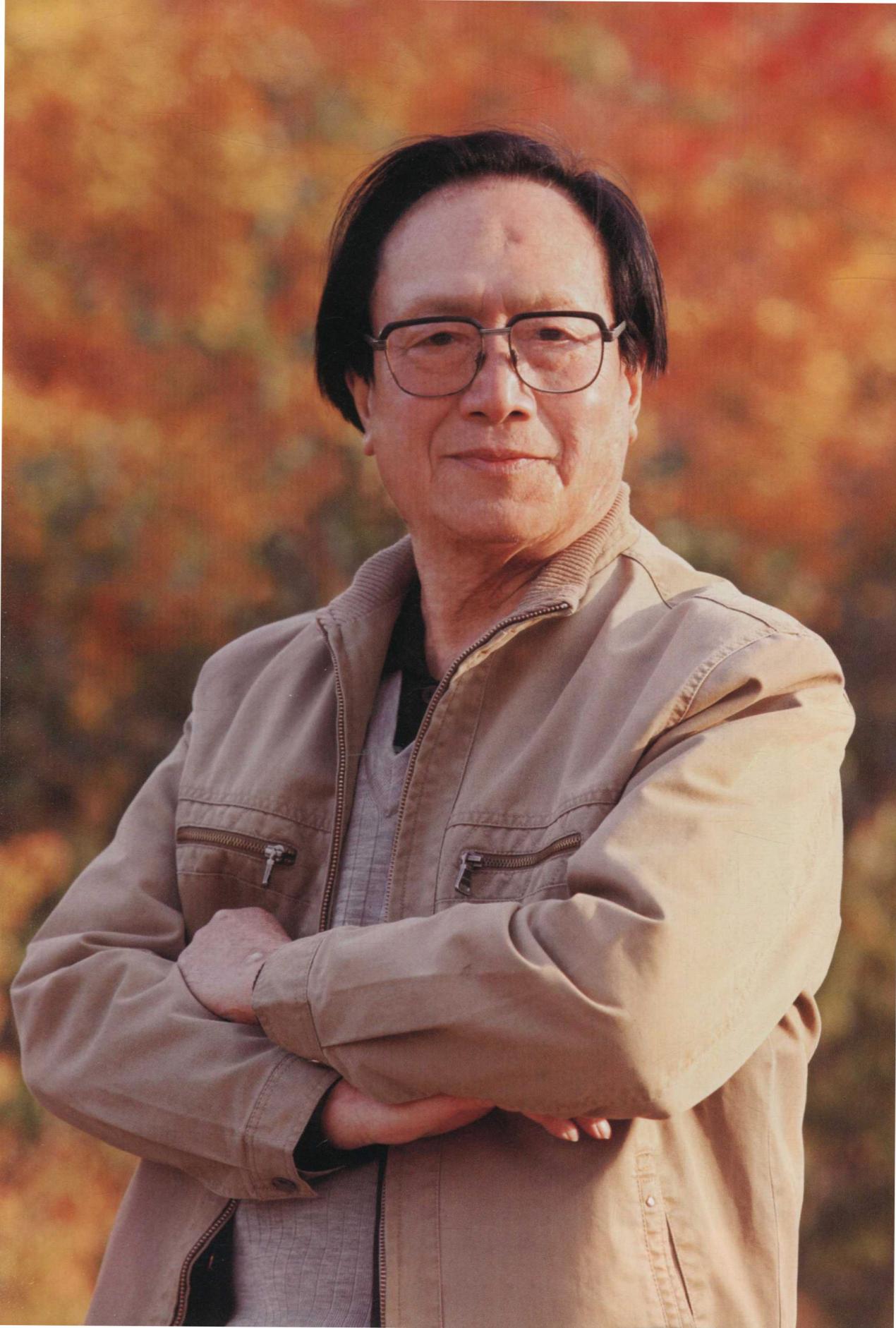
厚
金

2015.11

賀

七
狗
牙
集

赵国柱 题签





2010年10月与挚友德身于北京鸟巢



2008年冬与妻慧芳于广州

只此文章真

餘霞散成綺，

澄江靜如練

——南朝齐·谢朓

总序

只此文章耳

孙 涛

厚余兄诚邀我为其即将付梓的《独自文存》写篇总序，我自知才学不够，笔力不逮，但多年朋友，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了。厚余兄长我八岁，从彼此相识，到一同共事于太原市作家协会，已经三十余年，可谓人熟、心通，文字交往，更是不可细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秀才人情一张纸，不为厚余兄写点文字，我心里也过意不去。然而，用什么标题，才能概括厚余兄七十多年的人生和他即将付梓的《独自文存》呢？我想，简略地说用五个字即可总结，那就是太原明末清初一代文宗傅山先生所言：“只此文章耳。”

最初与厚余兄相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其时，我刚刚拿着一纸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山西大学毕业证，被分配到太原市北郊区委通讯组“帮忙”。政工组领导对我说的明确：你出身不是“红五类”，先去“帮忙”，依表现再决定去留。“文革”前，极左思潮已越刮越盛，考大学政审第一，成绩第二，已是公开的秘密。我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虽对北大心向往之，却在报考志愿时被器重我的知心班主任偷偷告知：报考北大是绝无一点被录取可能性的。后来，我幸好考入了山西大学，然而，天降不幸，“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革文化命。我在大学五年的生涯中，竟有四年是在“文革”中度过。此时的我像一片飘零的树叶落到了太原市北郊区，能到通讯组“帮忙”，挣一份工资养家糊口已属幸甚，绝不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当时的通讯组只有两个人，一次领导派我到小井峪公社下乡，听说

总序

这里有位插队的中学语文教师叫张厚余，是北大毕业，便萌生了相识的念头，虽说是想为领导物色个称职的通讯组干事，更多的，还是对北大毕业生的仰慕。亲历了“文革”的我，在思想深处，已经有了与官方宣传相反的认识，如山大中文系的教授马作楫先生、高捷先生、魏丕一先生等，他们当时或是被打成“牛鬼蛇神”被专政，或是正接受批判的对象，然而，在我与他们的私下交往中，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却都是忠厚长者和博学贤者。作为教师被下放到小井峪公社的这位北大生，肯定也是属于“牛鬼蛇神”或受批判对象一类，但是，我却认定：这些人中，不乏真才实学之士，能认识他，能让他也去通讯组“帮忙”，今后遇到学问上的事，不是就有了可求教之人吗？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与张厚余认识了，他那梳得整齐的背头，满面的笑容和谦和的神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区上后，在向政工组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我着意提到了张厚余，并且，怯怯地建议：是否可以让张厚余也来通讯组“帮忙”？闻听此言，那位领导猛然瞪起“山羊眼”，将一句冷冰冰的话甩给我：“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右派？”我不敢再说什么，当时，那首风靡全国的歌《社会主义好》，我在大众必唱的场合也跟着唱过，右派是什么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党和人民的敌人呀！

后来，我还多次去过小井峪公社，可是，再也没有见到张厚余。听说，市里和区上整顿下放干部，张厚余又被发送到离省城更偏远、更艰苦的娄烦县插队去了。

与张厚余再度相见，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其时，我被卷入北郊区清查扩大化中的一场大冤案，平反后，执意离开那片土地，调入了太原市文化局《并州文化》编辑部。当我着手创作一部以傅山先生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朱衣道人》时，张厚余与侯文正两人业已编撰完稿的《傅山年谱》，就成了我案头的必读之物。也正是这位在新时期获得平反昭雪的北大才子，在我的《朱衣道人》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出于对傅

山先生的共同敬仰，当即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为我这部作品做了评点。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交往多了，我也就由衷地称其为厚余兄了。

厚余兄出生于山西省寿阳县上曲村一个有着文化传承的普通农家，父亲是县城中学的一名教员，这让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自幼喜欢文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以优异成绩，一举登科，考入北大。那时，他的面前仿佛阳光扑面，鲜花铺路，满腹诗情，喷涌而发，但谁又能想到，“伟大领袖”的一场“阳谋”，在全国知识界，一下子就网罗了五十多万右派。而在 1958 年的反右派补课中，一心讴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张厚余，也因一首阶梯诗中有几句批判现实的句子，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北京大学党委顺利地完成了补抓右派的指标，然而，一名对党忠诚、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却成了中国右派大军中的一名小兄弟。此后二十年，张厚余当右派的痛苦自不必说，即便摘了右派帽子的他也受尽了人间苦难，但是，作为教师的张厚余，在他的学生们的印象中，却始终是一位敏而好学、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然而，那时的厚余兄并没有什么文章能够发表，其中的原因我深有体会。1978 年，我投给《人民文学》的一篇以反思“文革”为内容的短篇小说被编辑部选中，杂志社给太原北郊区委政工组来函，提出对作者进行政审。政工组回复：“此人受审查尚未解脱，不同意发表。”这篇小说便只能被编辑部割爱了。在那个报刊发表作品前，编辑部必须向作者单位发函政审的年代，厚余兄岂能提笔为文？他是在忍着心底剧烈的屈辱和悲痛，无奈地将一支生花妙笔束之高阁了啊。

“文革”结束后，厚余兄的笔下终于喷发了，这是压抑既久、政治生命获得新生后的一种喷发，也是他多年坚持不懈的学识积累在中国进入新时期后，一种不发而不足为快的喷发。1981 年，他调入了太原日报社，在《太原日报》副刊部任职。在我主持太原市作家协会工作时，他又被选为

太原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依旧是梳得整齐的背头，依旧是满面的笑容和谦和的神态，但是，我能看得出来——更多的是从他的创作和言谈中能感觉出来，他比以前年轻了许多，这是一种政治生命获得新生后心态的年轻和灵魂的再生。许多年来，他以记者的身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太原市的大街小巷和郊区的山川小路奔波，采访毕，便赶回家，在灯下连夜写作，记录下时代的脚步，书写出各类人物贴近时代和底层生活的原生态气息；他以学者的治学精神，每逢节假日，总是山西省图书馆或太原市图书馆的常客，翻阅史料，查检典籍，或埋头记录，或凝眉沉思，于是，一篇又一篇学术论文和名作赏析，在浸透着心血的写作中成文了；他以文学评论家的姿态，活跃在省城和全国的文坛上，赞美好的作品时，不乏精辟的分析，而批评作家的作品时，那怕是著名的、与他本是朋友的作家的作品，也直面坦言，显露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不随俗、不媚世的风骨，且不说当年 he 对外省作家叶蔚林作品的批评轰动全国文坛，就是对诸如韩石山、董耀章等省城作家诗人的批评，也让文坛同仁不得不敬其文笔的直率和尖锐，以我为例，既得益于其著文为我的作品叫好，也受益于其在有我在场的会上，对我的作品的批评。对厚余兄文学批评的评价，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便当事者对其反批评，也是正常现象，可叹的是，当年厚余兄的这种批评精神，在今天的文坛更显的难能可贵了。

正是记者、学者、文学评论家的三重身份，或者说是集三重身份为一身的北大才子张厚余，终于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属于他的春天。晚吗？是晚了一些，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春天是来的晚了，可是，比漫长的冰天雪地继续封杀春天，总要好了许多。更可敬的，是厚余兄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退休生涯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他不仅继续笔耕，同时，整理出既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的曾经发表的文字，命名为《独自文存》筹划出版，这些文字，是一份北大学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立此存照，也是厚余兄奉献给社会和他的后人

们的一份丰盛礼物。正如傅山先生所言：“所留在天地间，可增光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

自古所谓序者，大多是评介书中内容的文章，但《独自文存》的每一集中，已有厚余的朋友们各自为序，我岂敢在总序中，再对其文章随意指点？忆些旧事，谈点感想，遂成此文，如蒙厚余兄不弃，放在《独自文存》开头献丑，作为对读者了解厚余先生的一种导语，则我之幸也。

2013年3月30日

作者孙涛为太原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共太原市委、市政府嘉奖的太原市优秀专家。曾被市文联授为太原市杰出贡献艺术家称号，被中共太原市委授为太原市文化领军人物、优秀作家称号。有二十余部专著出版。

序一

真金总会发光

李德身

是真金总会发光，哪怕是尘封火燎，雨骤风狂。面对厚余这三集文稿，我难禁心潮奔涌，思绪如云，既激赏它贵过真金还无价，又感叹任何得势一时的暴力终究无法摧毁它固有的光芒。

记得五十六年前，厚余和我一起跨入北大的校门。他爱诗，我也爱诗，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当时班上爱诗的同窗，还有孙玉石、孙绍振，我们经常切磋诗艺，互赏诗作，不断在本班的《小火星》墙报和学生会的《红楼》刊物上发表新诗。厚余和我同住一个寝室，又都爱钻图书馆，两人接触更多，天天可以倾心恺谈，未名湖畔不知留下我俩多少青春的足迹。

在 1957 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当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而又天真，坚信领袖承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真诚。为了响应党中央助党整风的号召，厚余凭着诗人的秉性，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赞美北大具有“五四”的民主传统，要为北大发扬民主传统而歌唱。他希望我能署名其后，以壮其声。我当即毫不犹豫地写下自己的姓名，并且一起将它正大光明地贴到小饭厅的南墙上。岂料到了 1958 年临放寒假之际，新官上任又来个“反右补课”，厚余因此坠入了“阳谋”的罗网，我也为之戴上了滴血的荆冠。

此后二十个春秋，随着中国政局越来越“左”，厚余和我都为此饱受“运动”的折磨，尝尽人格的屈辱。但是，从我俩在北大遇难之日起，“卫道”的打手们休想获得厚余或我揭发对方的一丝一毫的“罪证”。即使厚

余退回太原，我则流于巴蜀，彼此依旧以诗传情，互相砥砺，一段充满血泪的苦难史，倒是成全了我俩终身无话不谈的人生知己，足可信赖的斯世同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我俩才迎来了生命旅程中的第二个春天。

苍天不负有心人。厚余和我都以超出常人的勤奋去追补被迫蹉跎的岁月。八十年代中期，我接到他寄来的厚书《傅山诗文选注》，初露一个学者渊博的功底；九十年代，他先后寄来了诗集《凝春集》、散文集《秋华集》和文学评论集《寻芳屐痕》，全面展示了他作为诗人、记者、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的杰出才华；新世纪以来，他还给我寄来了专著《太白诗传》、《杜牧集》、《关汉卿卷》和《明清小品文选》，将他作为学者的成就推向了新峰。这当中，还不包括我俩合著，被他称为“扶摇奋飞工程”的《历代微型故事鉴赏辞典》以及数十万字十卷本的《历代诗词鉴赏辞书大系》，等等。他是如何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伏案爬格、奋起直追的情景，由此可以想见。他是豁出命来干的啊！

去年十月，我俩一同参加北大中文系百年大庆，连续三天形影不离，促膝长谈，一扫多年睽违、魂牵梦绕的挚情。今年四月，他发短信告知，他把近年发表的文章编成三集，望我作序，而且强调“非你莫属”。我因其时体状很差，得病住院，属他另请海内名家，以高身价。延宕月余，病体稍安，我仍挂心此事，问他找到合适人选否，不然，我只好勉力为之。他一得知我心松动，不由分说便将文稿以特快专递寄来，并附信说：“无论咱俩的交情，亦无论是彼此间的了解，无一人能过你。有你的文字在，就是我平生最大的慰藉。”我想，厚余是实在人，说的是实在话，即使是为知人论世，我也该提起笔来，以一个知心朋友的身份，说一说他这些文稿来之不易的背景，因而写了如上的话。

至于我说厚余的这三本文集“贵过真金还无价”，并非只是出于私交的偏爱，也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发自内心的感受：真金有价情无价，文章真情胜黄金！你看他无论写的是那种文体，总有一股真情融贯其中，笔调虽

然有别，万变不离其宗。这种与生俱来、后天愈涨的真情，足可以感人心，动天地，泣鬼神。细玩他对三本文集的命名，无论怎样显示文体的特点，总在寄寓内在的情思，他的天然素质实在是一位永葆赤子之心、长燃青春之火的诗人。

他的《独自文存》评论集，蕴意取自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来显其论今评古、卓立不群的己见。他一反当代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下泛起的以哗众取宠为荣的奇谈怪论，始终认为文艺是为社会、为人生的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实事求是，绝不违心。他无论极力维护鲁迅先生的尊严，推重山西五老作家的散文，解读饱经磨难的诗人沈泽宜的《竹》诗，还是针砭“皇权崇拜”剧泛滥成灾的社会现象，批判《世纪之骗——“中国新诗”》的妄言胡说，乃至痛斥一个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诬谤鲁迅、老舍、钱钟书的狂妄无知，等等。除了表现学识的渊博、见解的独特、说理的透辟、文笔的犀利、分寸的适度而外，字里行间更洋溢着爱憎强烈、褒贬鲜明的真情，甚至可以想见他在奋笔疾书时难以抑制的激情。

他的《涛头集》，乃是取意于宋代词人潘阆“弄潮儿向涛头立”的警句，用以突出其记者生涯中所写的报告文学的惊世骇俗。他有幸对当代诸多的高层领导、红军宿将、社会英杰、著名学者和文学艺术界的风云人物进行专访，倾其仰慕之心、敬重之情和由衷之爱，绘声绘色，肖貌传神，大笔勾勒出这些时代弄潮儿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树立起一座又一座可供后来人追思、学习和永恒纪念的丰碑。其中有不少饱受历次“运动”冲击却矢志靡它、九死未悔的共和国精英人士，像王光美、费孝通、杨伯峻、丁玲、艾青、萧军、吴祖光、牛汉、邵燕祥、刘绍棠等等闪闪发光的名字，一度都曾被打入另册，但他们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又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些时代弄潮儿的音容笑貌和感人业绩，在厚余笔下显得那么真切而鲜活，因为厚余同他们心心相印，和谐共鸣。厚余本人就是一位勇于冲浪、百折不回的时代弄潮儿。